

论法制诚信

彭定光

(湖南师范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法制诚信是一种不同于人格性诚信的制度性诚信,它是法治社会中组织社会生活的首要力量。法制诚信由立法诚信、司法诚信和守法诚信所构成。立法诚信包括立法过程方面的诚信与法律设计方面的诚信。司法诚信包括对法律忠诚及法律运用过程的公正(包括司法公正和执法公正)。守法诚信则体现在公民真诚地认同法律、自觉地遵守法律和积极地使用法律上。

关键词:法制诚信;立法诚信;司法诚信;守法诚信

中图分类号: 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529(2007)06-0009-04

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道德要求,诚信有着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人格意义上的诚信(简称人格性诚信),二是制度意义上的诚信(简称制度性诚信)。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如维系前者的力量是人格,维系后者的力量则是制度,但是,它们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共同对社会生活起着作用。在制度的地位及作用愈益突出和重要的当今社会里,我国学术界将诚信研究聚焦于人格性诚信上而很少论及制度性诚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制度性诚信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在法治社会里,其中最重要的当为法制诚信。由于法制是一个由立法、司法和守法所构成的体系所决定,法制诚信包括立法诚信、司法诚信和守法诚信。拙文对此予以尝试性探讨,以期推进我国学术界关于制度性诚信的研究。

一、立法诚信

社会中诚信的发生或者基于可信的人格,或者基于大家共同信守的规范。前者限于熟人范围,后者则主要存在于公共生活领域。由于有了规范,人与人之间就能相互信任,社会就能建立起诚信的格局,因此,首要的一环就是建立规范,即立法。

立法并不简单地是一个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它同时也内含着公民会不会自愿地依法的问题,也就是立法是不是有诚信的问题。立法中的诚信包括立法过程方面的诚信与法律设计方面的诚信。

立法过程方面的诚信是指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不受偏私因素的影响或者外在压力的不合理干扰。这实际上是一个在立法过程中如何坚持合理性原则的问题。首先,它对立法者提出了要求,即立法者应该可信。立法者的可信具体表现在他具有全面的专业知识,坚持法律精神,不受自身的性别、种族、民族、宗教、党派、职业、情感、兴趣等因素的影响,能够坚持公正的立场和合理的价值标准。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立法者的有限理性是否会成为民众不信任立法

者的理由。众所周知,法律总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或者是由立法者的偏私因素所造成的,或者是由立法者的有限理性所导致的。前者意味着所立的法是一种恶法,后者只是表明所立的法是有问题的或者不完善的法。前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后者却只能如此。因为社会生活总是不断地变化的,人们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因此,立法者所立的法在未来的生活中一定会有漏洞,总会显示自己的局限性。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应该怀疑立法者的诚信,不应该否定法律的合理性和权威性。

其次,它应该排除利益集团对立法的不合理干预。由于法律规定了社会资源分配的模式和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因此,多种多样的利益集团都会在立法时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对立法者施加压力,甚至收买立法者或者其他可以影响立法的人(如专家和记者),以便法律能够反映自己的要求。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弱势利益集团就有可能找不到自己意愿的代理人。为了确保立法符合诚信的要求,立法者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反映和兼顾各种利益集团的合理要求,不受强势利益集团和不合理的舆论的影响。

再次,它应该肯定公民的合理要求。立法并不只是立法者的事情,所有公民都对立法负有责任。公民是法律作用的直接对象,他们对法律的实施有真实而又深刻的感受,因此,他们会提出反对恶法、改善有局限性的法的要求。反对恶法、改善有局限性的法既是公民的法律责任,又是公民的道德责任。立法者应该在立法中反映公民这些合理的要求。

法律设计方面的诚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法律内容方面的诚信,二是有关法律形式方面的诚信。

法律内容方面的诚信,首先表现在法律具有合理的道德基础。这是法律设计方面的诚信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方面。这种道德基础并非单一的道义论的,而是既重道义又重功利的道德。如英国政治学家 E·柏克所说:“法律有两个基础,且只有两个基础。它们两者都是法律赖以存在的条件,无此

收稿日期:2007-05-26

作者简介:彭定光(1963-),男,湖南双峰人,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条件,任何事物都不能赋予法律以效力。这两个基础就是公平与功利(指‘普遍的公众的功利’)^{[1](P285)}。它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是从公民的真实需要出发的,是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的。说到底,经过立法过程所制定的“这些法律除了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2](P89)}。这是法律得到民众的普遍忠诚和自觉遵守的前提,是法律效力真正得到发挥的保证。没有合理的道德基础,法律就不再是人解放自己的手段,而可能会成为压抑人的异己力量,民众不但不会服从它们,而且会坚决地抵制它们。这是那些短视的认为法律与道德无关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其次,注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既对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予以尊重,又对人应尽的义务进行规定,这是立法诚信的要求。如果法律只规定一部分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而对其他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不予以明确的规定,这些人的权利就可能在遭到侵犯时因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据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法律对拥有特殊权力的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而对其应该履行的相应义务没有予以规定,他就可以不履行应尽的义务甚至想方设法地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

再次,预防恶行。恶法与良法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纵容恶行,后者则遏制恶行,并为善行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恶法肯定是不诚信的法,良法则一定是重诚信的法。制止恶行被人们规定为法律的一种价值取向,甚至是根本的价值取向。人们在设计法律时一定要有关于恶行的明确意识,一定要有抵制恶行的具体措施,否则,恶行就会成为法律秩序的破坏者,人们就会成为恶行的直接受害者。如果说纵容恶行的恶法是不诚信的法的话,那么,对恶行预防不力的法则是失信的法。

最后,法律应该具有恰当的宽容度。人们一直怀有严刑峻法的期望。这种期望是人们认为所有的不正当行为都应该受到严厉制裁的心理依据,也是当事人主张权利、旁观者打抱不平的主观理由。其实,并不是所有不合法的行为都一定要受到严厉的制裁,并不是所有的违法者都应该被剥夺权利和限制自由,法律应该有一个合理合情的限度,应该有一个从放任到制裁的可容忍的中间地带。这种可容忍的限度应该在法律上得到明确的反映并且不受法律的追究,如 1989 年颁布的《美国行政部门雇员伦理行为标准》规定了行政部门雇员“从外界获得馈赠的禁令有几种例外,如在某种限定下,雇员可以接受:1. 每次不多于市场价格 20 美元的非索取的馈赠,一年内从一种渠道所接受的馈赠不超过 50 美元;2. 基于家庭关系或者个人友谊而赠送的物品;3. 在招待费用由发起人承担时,所参加的范围广泛的集会,如会议和招待会;4. 在国外任职期间,在一定的会议或活动中的食物、茶点和娱乐活动。”^{[3](P499)}如果法律没有明确地规定可容忍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那么,就会人心惟危,人人自危。让人担心其不正当行为会受到严厉制裁的法律是会失去民众的信任的。

法律形式是表达法律内容的方式,是法律设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也是立法诚信的一个重要内容。有关法律形式方面的诚信,首先表现在法律的全面性上。法律的全面性是指法律规范是完整、内洽而没有漏洞的。为此,需要堵塞法律规范中的漏洞。法律规范本身的漏洞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法律规范的结构不全,互相独立而未形成一个具有

内洽性的整体,以致彼此矛盾冲突;二是某种法律规范不严密,有空子可钻,这为不良者提供了无风险的作恶空间,可能出现法律规范管不着的现象。如果法律规范不全面,就会使法律表现出不诚信,也会使公民对法律规范产生不信任感。

其次是法律规范的稳定性。法律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必须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其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规范没有相对的稳定性,可以随便变来变去,否则会使人们产生一种法律上的不安定感,会使人们厌恶法律。如果是这样,立法就是不严谨的,法律规范就是不严肃的。法律规范的稳定性是人们对法律产生信心的前提,也是法律有效力的一个标志。

再次是法律规范的明晰性。它要求法律有着确定的界限,是对某种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既反映这种社会生活又反映那种社会生活的法律条文尽管可以被制订出来,但由于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必定会丧失其有效性,因此会失去民众对它的信任。同时,法律规范应该尽可能地明确,应该语言准确、没有歧义。含糊不清的法律规范会使人们举棋不定,无所适从,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张维迎指出:“法律规则过于含糊,也是中国司法腐败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4](P55)}

二、司法诚信

立法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其结果是建立起可信的法律规范。司法则是法律如何运用的问题,是法律被诚信地运用。而法律的运用并非仅指作为特定权力机构的司法机构的审判活动,而是一个从对违法的法律认定到判决执行的全过程。司法诚信就体现在这一过程之中。

与立法诚信主要是一种实体诚信或者实质诚信不同,由司法主要是一个法律的运用过程所决定,司法诚信主要是一种程序诚信。西方著名法学家富勒认为司法的程序诚信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法律适用方面的普遍性原则,即“同样的情况受到同样的对待”,它所坚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二是执法方面的同一性原则,即他所说的“官方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原则,它要求“政府应忠实地运用曾宣布是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始终一贯地运用法律。这就是说,司法诚信一方面表现在对法律的态度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公民的态度上。

既然司法诚信表现在上述两个方面,那么,司法诚信的主要内容就有如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对法律忠诚。司法者应该忠于法律,这是由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所决定的。忠于法律,就是尊重法律,严格地按照法律规范来从事一切司法活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司法者视法律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身试法,司法就无诚信可言,就会导致民众对法律的失信。

其次是法律运用上公正。司法者在运用法律时应该坚持公正性原则或者赏罚分明原则,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王制》),反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因人而异的做法。

法律运用的公正主要包括司法公正和执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者依据法律对当事人所作出的公正判定^[5]。这种公正判定不考虑一个人的道德人格或其道德是否优劣,而只考虑他是否违法以及违法的程度。因此,“不论好人加害

于坏人还是坏人加害于好人,并无区别……法律则一视同仁,所注意的只是造成损害的大小。到底谁做了不公正的事,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谁害了人,谁受了害,由于这类不公正是不均等的,所以裁判者就尽量让它均等”。^{[6](P95)} 执法公正并非只有实体公正,而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它不仅仅解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谁害了人,谁受了害”并使施害者与受害者恢复到损害行为未发生时的状态的问题,即实体公正问题,还体现在执法的程序公正即当事人(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在执法活动过程中受到公正的对待上。司法公正和执法公正是法律运用公正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但相比较而言,司法公正比执法公正更重要、更根本,正如弗·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7](P193)}

司法诚信的主要内容表现在司法活动中就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一是准确认定。对违法的法律认定包括对违法者的法律认定和违法事实的法律认定。前者是指通过法定程序来证明某人是不是违法者,是不是够上了违法的条件,是否有确凿证据来认定某人就是违法者,不可妄测,不可捕风捉影,更不可胡乱抓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假错案,对当事人是最大的不幸,于司法而言是最严重的不诚信。后者是指有没有违法事实,某一事实是不是构成了违法,这一事实是不是清楚,是不是当事人所为,切不可偏听偏信、虚构事实,更不可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如果没有经过对违法者和违法事实的法律认定就羁押他人,司法就失去了诚信。

二是依法判定。接着法律认定之后的过程就是审判。它是依据法律认定的结果和法律条文对违法者予以量刑或者其他处罚的过程。它要求用法正确,审判公正,量刑准确,这是司法诚信最基本的要求。可是,在此很容易发生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的问题。

导致司法不诚信即司法不公正或者司法腐败问题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有两种情况:一是法律规定的量刑并不是精确的,而是有一个从最低量刑到最高量刑的取值范围的,这为司法不诚信提供了可能性。二是法律具有滞后性。社会生活的迅速变化使法律不可能对未来将发生的违法作出详尽的规定,这使得司法者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出现之后无法可依。其次是司法者拥有自由裁量权。这种权力是法律所赋予的,是为了克服法律本身的缺陷和不足的。法律是注重普遍性的,“是针对大多数的,有时难免弄错……既然立法者说了一些笼统的话,有所忽略和出现失误,那么这些缺点的矫正就是正确。……纠正法律普遍性所带来的缺点,正是公平的本性。”^{[6](P101)} 司法者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前提则是相信司法者能够坚持法律正义,能够遵循司法诚信原则。然而,司法者难以如此行事,彼此的判决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别^{[8](P99)}。在此情况下,司法诚信、司法公正就很难保证。再次是司法者索贿受贿、知法犯法。司法者或因亲朋故交而庇护,或因权势而不得罪,或因贿赂而重罪轻判,这会严重地影响民众对司法的信任。

三是公正执行。判决执行的公正,首先表现在把违法者

或罪犯当人看。违法者或罪犯虽然暂时被剥夺了部分公民权利,失去了自由,但他作为自然人仍然具有其权利,其生命权利和人格权利是不可被剥夺的。其次是不给予任何违法者或罪犯特殊对待。再次是判决必须坚决执行。无论是刑罚的执行,还是补偿与赔偿的到位,司法机关必须彻底、如期执行。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其效果不但不如无判决,反而比无判决所造成的后果更严重。事实的确如此。

司法诚信问题是当前社会生活所面临的重大诚信问题,它直接关系到腐败能否得到治理,社会秩序能否保持安定,人们是否感到安全踏实。因此,我们应该在实现司法诚信上大做文章。司法诚信的实现,首先取决于司法者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其次取决于司法者守信和合法地运用法律的程度,再次取决于司法的独立性,最后取决于法律监督。只有这些条件都同时具备,司法才会有诚信。

三、守法诚信

法制诚信存在的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存在依赖于一系列的前提性条件,这些条件既有制度性的,又有非制度性的。其制度性条件存在于从立法、司法、执法到守法的各个环节之中,但其中至为关键的条件却是有着法律精神的公民,是全体公民的诚信守法。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9](P199)} 这就是说,法治的实现只凭借制订得相当完备的法律或者良法、仅仅靠国家强制力是远远不够的,它还依赖于所有公民都尚法、用法、守法。如果公民不真诚地守法,甚至逃避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法制诚信就难以实现。

守法既有普通公民的守法,又有作为公民的公职人员的守法。守法是每个公民的职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心甘情愿地、无条件地承担这种职责。罗尔斯分析了“一般都具有一种有效的正义感”的公民可能不守法的两种情形:“从自我利益的观点来看,每个人都想减少他的份内职责。……当公民相信或者合理地怀疑其他人不会尽职时,他们就会想法躲避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10](P325)} 在组织良好且“公民一般都具有一种有效的正义感”的社会里尚且如此,在受“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传统思想影响的国度里,公民不守法的情况可能会更严重,因为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可能会因自以为拥有特权或者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而不守法甚至目中无法。公职人员不守法将会导致那些追求自我利益且力求减少其代价的人不守法,这样一来,守法诚信就不可能存在了。

守法诚信首先表现在公民真诚地认同法律上。公民真诚地认同法律,就是公民在理性上相信法律是建立在合理的道德基础之上的,相信法律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表达了公共意志,相信法律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能够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就是公民在情感上不怀疑法律,不拒斥法律,而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法律、尊重法律。

公民真诚地认同法律是有其动力基础的,这种动力就是公民真诚地认同法律的理由。这种动力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立法权源于公民。虽然法律并不是每个公民亲自参与制定的,但它却是由公民所委托的代表或者机构所制定的,当他

选举能够代表自己意志的代表或者具有合法性的机构制定了法律时,他的意志也就得到了体现,因此,“在卢梭看来,……自由就是服从于个人对自己的立法。这首先意味着,不仅是对法律的服从、而且立法本身都必须源自于个人。”^{[11](P284-285)}其二是法律是对公民权利的表达。凡良好的法律都不应该是统治者的私人意志的表达,相反,应该是公民权利的表达,只有这样,法律才真正有其普遍性,才会被公民所自愿服从。

其次是公民应该自觉地遵守法律。公民并不是因为要得到某种荣誉、迫于社会压力(如从众心理)或者受到惩罚而遵守法律的,是因为公民有守法的需要。这种需要首先源于公民对法律的认同,源于对自身可能存在某种恶性(如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 S·弗洛伊德所指出的人因有“本我”而有攻击性)的认识,源于公民认为自己是构成社会的一员因而既享有权利又要履行义务的道德觉悟。这就是说,公民服从法律、遵守法律而不违背法律,其动力不是来自外在力量的作用,而是来自内心,不是因为强制,而是基于自觉。

再次是公民应该积极地使用法律。使用法律也是守法的一种形式,它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当自己遭受他人侵害时,公民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一个连用法律来保护自己都不能做到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地守法的。二是当他人在实施某种不法行为时,公民用法律来劝阻其行为的继续,因为任何公民都有制止他人违法的义务。

守法不只是一种法律行为,它本身就具有道德意义。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守法是公正的,不守法是不公正的。这是不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法,只有公民服从法、守法才是道德的、诚信的,而不守法则是应受指责的、就不诚信了呢?这要进行具体分析。公民所守之法律,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良法,另一类则是恶法;从其具体形态来看,它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绝对良好的法律”,第二种是合理而可行的法律,第三种是有局限性的法律,第四种则是恶法。前三者即为良法。按照以往人们的观点,这四种法律都是可以公民所遵守的,所不同的是何者是被迫地遵守的,何者是自愿地遵守的。亚里士多德说:“人民可以服从良法也可以服从恶法。就服从良法而言,还得分别为两类:或乐于服从最好而又可能订立的法律,或宁愿服从绝对良好的法律。”^{[9](P199)}在此,亚里士多德并未对“可以服从”与“自愿服从”作必要的区分。“可以服从”虽然也是公民

对法律的服从或者遵守,但其力量却来自外部,是不得已而为之;“自愿服从”的动力则来自公民自身。可是,“可以服从”与“自愿服从”都不是应该服从或者遵守,只有应该服从才重视法律的道德合理性。可以肯定,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两种良法是有道德合理性的,是应该被公民所遵守的。但公民应该不应该服从和遵守恶法呢?同样可以肯定,每个公民都不应该遵守恶法,因为它是违背道德的。如果一个公民遵守恶法,就等于与狼为伴,为虎作伥,既违背了良心,还对他人犯有罪恶。既然一个人遵守良法而不遵守恶法是诚信的,那么,他遵守有局限性、有缺陷的法律是不是诚信的呢?他应该不应该遵守有局限性的法律呢?按照美国著名学者 J·罗尔斯的观点,公民在良心上可以拒绝这样的法律,并可以通过恰当的途径去影响立法,但在行为上却是应该遵守的。因为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制订出一部完善、理想的法律的,任何法律都是有局限性的,如果不遵守这样的法律,就没有别的法律可以遵守的了。

参考文献:

- [1] [英]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M].蒋庆,王瑞昌,王天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2]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3] 王伟.行政伦理概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4] 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北京:三联书店,2003.
- [5] 刘云林.法律运行道德追问的两重向度[J].伦理学研究,2005,(1):17-21.
- [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7] [英]培根.培根论说文集[M].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8] 曹刚.论法官的角色伦理.伦理学研究[J].2004,(5):68-73.
- [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 [10]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1]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On Legal System Honesty

PENG Ding-guang

(Institute of Ethic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legal system honesty is different from the personal honesty and system honesty.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rength the government organizes the social life by law. The legal system honesty is constituted by the legislation honesty, the judicial honesty and the honesty of obeying the law. The legislation honesty includes the honesty in legislation process, the honesty of legal design. The judicial honesty includes the loyal to the legal and the fairness in the process of utilization to the law. The honesty of obeying the law manifests that the citizen approve the law sincerely, abide by the law initiatively and use the law positively.

Key words: legal system honesty; legislation honesty; judicial honesty; honesty of obeying the law

(责任编辑:文 建)